

中国古代园林发展与净土和净土园林

吕 舟（清华大学 教授）

中国园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园林体系之一。隋唐之后中国园林开始出现了强调“意境”的倾向，并最终成为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和载体，从唐宋时期通过东亚各国的遣唐使对东亚地区园林的发展产生影响，在18、19世纪则通过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对欧洲园林产生影响。在中国园林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传统的哲学、信仰、宗教都在园林的主题、形态特征中得到了反映。

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唐宋之后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并传播到东亚地区。净土宗对日本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却没有在中国园林的发展过程中留下明显的印记。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种被称之为“净土变”的题材。在这些壁画中反映了人们所向往的西方净土世界的美丽景象。在这些反映净土世界的图像中，通常是建筑环绕的莲池上有巨大的平台，佛、菩萨们法相庄严的端坐，而伎乐天、飞天们则在展示她们美丽的身姿和舞蹈。这样的一种建筑、水面的布局方式与中国传统园林的发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否是一种成熟的园林或寺院布局方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汉魏两晋时期的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发端不晚于商周，《诗经》中已经有关于园林的描述。这一时期的园林通常以园囿的形态出现，为天子或诸侯营造，兼有行宫、种植园和猎场的功能。秦汉以后这种园林演化成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其功

能则仍旧保持了行宫、种植园和猎场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皇家园林中建筑、水、山等要素已经逐步成为园林的基本组成部分。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在其短暂的历史中营建了大量的宫室、园囿。在园囿营造中由于帝王迷信神仙传说，追求长生不老，出现了模拟大海和传说中海上仙岛的大面积的水面和岛屿的园林表现方式，水面和岛屿也因此而成为皇家园囿中具有象征性的重要元素。

汉代替秦之后，尽管“汉自有制度”，但在城市营建，宫室、园囿设计等方面则显然继承了秦代的许多基本意向，包括园囿中的大片水面。汉代的皇家园囿规模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开挖尺度巨大的水面，引入自然的水系之外，基本上还是截取自然的一部分，稍经营便成为可游、可猎、可植的园囿。这种园林营建的方式也影响到了当时贵族和富豪的园林。在文献所反映的袁广汉园林中，既有从园外引入的湍急的水流，鱼跃鸱飞宽阔的水面、沙洲和人工堆叠的山岭，又有大量树木、花卉，饲养的包括犀牛在内的动物。

经过三国时代的动荡，氏族的崛起和皇权的削弱，政治的反复变化成为两晋时期的社会特征。推崇黄老之说，发展玄学，寄情山水，放浪形骸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时尚。玄学、归隐成为这一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标志，而由于对风骨和品格的追求，使文人士大夫阶层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和威望，皇室不断邀请归隐的名士重回朝廷，而社会的审美趣味也受到这一阶层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规模巨大的皇家园囿或私家园林的营造活动已少有进行，但对自然的审美，以物寄情的文人趣味，甚至名士们的生活方式却对这

一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契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注1）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所表达的那种情趣与审美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

两晋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传入的佛教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步从宫廷走向民间，但有意思的是除了那些来自西域的僧人之外，即便是一些著名的高僧也往往精通黄老之说，例如东晋的慧远。慧远不仅与当时的名士交往，他创建的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最早团体的白莲社也更接近于一个当时流行的隐士集团。在他择地建立东林寺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审美趣味与当时的玄学名士们并无二致：“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旁带瀑布之壑。仍石构基，既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注2）

二、净土宗和“净土变”壁画

关于慧远（公元334—416）：“慧远学问兼综玄释，并擅儒学”（注3）。由于晋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慧远深信报应之说，以投生西方阿弥陀净土为愿。“远公既持精灵不灭之说，又深忧生死报应之威，故发弘愿，期生净土。元兴元年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莱民、张季硕于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首曰：‘维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注4）。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净土宗的肇始。慧远公元386年前后在庐山创立的东林寺则成为净土宗的发祥地。

真正创立净土宗的则是北魏的昙鸾。“北魏昙鸾家近五台山，内外经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究。后南游梁，为武帝所重。后还洛下，遇菩提流支，授以《观无量寿经》遂有所悟。晚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专唱净土，撰《礼净土十二偈》、《安乐集》二卷，广流于世。故后人推为净土宗初祖云。”（注5）昙鸾之后道卓继续在玄中寺弘扬净土宗，著有《净土论》二卷，被称为净土宗二祖。

善导（公元613—681）被认为是净土宗的第三代祖师，他曾著《观无量寿佛经疏》、《往生礼赞偈》、《净土法事赞》等著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还曾画三百幅“净土变”图，并将绘制“净土变”作为一种修行和功德。这种题材的壁画在当时的寺庙中是一种常见的传播佛教信仰的方式。今天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开凿的窟龕中还能见到这类的净土变题材的壁画。

敦煌现存的“净土变”主要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以宏伟的建筑、七宝莲池、八功德水、缤纷的花卉、菩萨、乐师、飞天等构成一幅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景。但显然这样一幅图景是无法凭空创造出来的，它必然有现实的蓝本。帝王的宫殿、规模巨大的寺庙都成为这幅“净土”图景创作的源泉。根据对唐代宫殿遗址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净土变中的建筑布局形式与唐代宫廷建筑之间的关系。而水池、莲花等内容则显然源于佛经的描述，是对“七宝莲池”、“八功德水”的附会。

宋代以后在一些寺庙中出现了“净土池”等称谓，但仍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净土变的图像反映了净土宗寺庙特殊的布局规制，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流行的“舍宅为寺”的功德行为却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寺院布局的方式。

三、唐宋时期的中国园林

中国古代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了一种文人士大夫文化的特征，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情趣主导着社会的思想和情趣，构成了社会的主导意识。唐代之后，中国园林的发展开始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追求宏大、华丽的园林风格，在中国艺术史上，这种倾向与以李昭道和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工笔山水画相互呼应，表现了奢靡、绚丽的审美趣味。另一种则是以文人园林为代表的俭约、清雅的园林风格，它与刚刚兴起的讲究笔墨趣味的文人画相互呼应，表现追求诗境的审美趣味。

唐代皇家园囿中最为重要的是大明宫的御苑。在御苑的中部是占地 1.6 公顷的太液池，池中有岛，池的周围则有大量的建筑。兴庆宫同样是唐代最为著名的宫殿，它的园林区也以水池为核心布置，水池的遗址大约占地 1.8 公顷。在这一水池周围，布置有宫殿建筑。帝王在这些殿宇中接待外国使臣，举行殿试，观看各种表演。东都洛阳的西苑也以人工开凿的“北海”为中心，“海”中有三岛。但从现有文献看不到有类似“净土变”的布局方式或者在建筑布局上受到“净土变”形式的影响。

唐代是一个私家园林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文人园林更是成为了一种风尚。王维的辋川别业成为中国园林侧重意境创造的典范；白居易一生更是营建了多处宅园。王维及其友人在辋川别业中赏景，赋诗，以景寓情，并将诗文集为《辋川集》，将景色画成《辋川图》。这成为中国造园史上的一件美事，开中国园林意境表现的先河。而文人的私家园林则成为园林意境营造的倡导者和实践地。王维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写到：

“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句佳，斯之不远，尚能从我游乎？”高远、晴明的意境跃然之上。

关于宅园，白居易写道：“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莫道两都空有宅，林泉风月是家资。”显然在白居易心中，林泉风月是他营建宅园的目的。在他的园林当中草木生情，一石一竹皆是品格：“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可师”，“池晚莲芳榭，窗秋竹意深”。

唐代宅园的营造之风可以被看作是两晋、南北朝形成的隐士文化的延续，追求一种都市中的山林，实现隐居，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这样一种心态对于一个一面可以影响君王，一面又是平民敬仰的对象的阶层而言，是很容易影响园林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方向的。

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受到帝王的尊重，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也具有了更大的社会影响。随着文人画，特别是山水画的发展，在园林中讲究“诗情画意”，重在意境表达的手法更趋成熟，而绘画中写意的表现手法促进了园林设计的发展。私家园林在宋代成为一种风尚，以至于出现了“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的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园林逐步成熟，出现了以“简远”、“疏朗”、“雅致”和“天然”为特征的园林风格。

宋以后，帝王文人化的趋势，使得皇家园林在营建当中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人园林的特征。例如宋代最为著名的皇家园林“艮岳”除了规模巨大，以及从各地收集的大量奇石异卉之外，在园林设计手法上和当时的文人园林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宋徽宗自己在《艮岳记》中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这种趋向一直延续到清代。

寺庙园林是中国园林的一个主要部分，由于没有现存的实物和清晰的考古材料，而且文献中对这一时期的寺庙园林的描述大多十分简约，例如：长安的大荐福寺“寺东院有放生池，周二百余步，传云即汉代洪池陂也”（注6）。长乐坊的光明寺“山池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注7）。有些寺院的情况则是将园池填平，如崇义坊的招福寺，“寺内旧有池，下永乐东街数方土填之”；大兴善寺“寺后先有曲池...今复成陆矣”（注8）。从现有资料看不出唐代的寺院园林已经形成自己完整的风格，或者有相对成熟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唐以后的高僧大德们往往表现出极强的文人特质，且大多与当时的名士往来密切，这就使得寺庙园林也同样表现出文人园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尊崇某种固定的形态的园林形式本身就以产生影响。

宋代是中国净土宗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其影响仍难以和禅宗相比，也没有相关文献涉及净土宗寺庙的特殊格局或园林型制。相反，作为江南重要的禅宗寺院的灵隐寺似乎不仅仅是一座寺院，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风景名胜：“东南山水余杭为最，就郡则灵隐寺为最，就寺则冷泉亭为最。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撮奇搜胜，物无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气血；夏之日，风冷泉汀，可以除烦析醒，起人幽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注9）显然，追求自然和野趣也是这一时期寺院园林或寺院环境的特征，至少这种被赋予了特定文化内涵的自然野趣被认为是一种反映高尚趣味的园林形态，是一种无论私家园林还是寺庙园林，甚至皇家园林期望达到的境界。

四、中国园林中的水和水庭

水是中国园林中的重要元素，它使得园林变得灵动，也使得诗意与画境有了载体。白居易在他记述园林的诗文中有过清楚的描述，而王维的辋川别业，更是有

茱萸片、敬湖、金屑泉等水景。在皇家园囿中水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皇家园林中水不仅是一种景观要素，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例如作为疆土的象征、作为神仙国度的象征等等。而水与山的均衡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念同样也反映在园林的营建过程当中。在中国水还是财富的象征，这也促使人们在营造园林的过程中对水体的重视。

秦代“始皇引渭水为池，东西二百丈，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注10）；

汉代，武帝开昆明池“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擢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注11）；“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鹄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名眺蟾宫”（注12）；在建章宫内更开挖水池，在池中筑三山，象征海上仙山。另外在一些豪族巨富的私园中，也将水景作为园林的重要内容。《西京杂记》中描写了袁广汉的私园“激流水注其内，.....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浪潮”。

后燕（5世纪处）兴建龙腾苑“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符氏凿曲光海、清凉池”（注13）。

公元6世纪，北齐后主高纬建仙都苑。苑中堆土筑五山象征五岳，引漳河水分流四渎为四海。

北魏洛阳城中“华林园中有大海，即魏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注14），洛阳城西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殿前九龙吐水成一海。”（注15）

唐代皇家园林中水面作为核心景观的手法，在长安的大明宫、兴庆宫，以及东都洛阳的西苑等主要宫殿区的园林中都有所反映。唐代曾在汉未央宫遗址上建通光殿，两侧为诏芳、凝思二亭。洛阳宫内流杯殿也是两侧出亭，环绕水池的布局形式。渤海上京禁苑的考古遗迹也反映了类似的布局方式。这些皇家园林的美丽景色可能成为人们描绘西方净土世界的蓝本。宋代的金明池，尽管建池的目的为训练水军，但从格局上仍然表达了严整、对称的意向。

私家园林，特别是文人园林的兴起，使得意境的表达成为园林设计的核心内容，风月云影，水面与岛屿、山阜，模仿、重现自然中的关系成为园林造景的主要方式，规整、对称的布局关系不再是园林设计的主要手法，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的皇家园林中，这种手法仍时有出现，例如颐和园前山建筑群与昆明湖的对位关系，但这种园林手法并无净土世界的宗教含义。相反更多的包括皇家园林在内的园林在文人园林意境表现的方向上有了更多的发展，例如承德避暑山庄。

对寺院而言，七宝莲池、八功德水之类，佛经中曾经提到的内容，始终是寺院乐于表达的题材，然而在格局上却没有看到关于相对固定的模式的记载。苏州的西园是著名的寺庙园林。西园的核心是放生池，东岸有“苏台春满”轩，池中有亭，并经两道九曲桥与东西两岸相连，格局上多少有些“净土变”的痕迹。昆明圆通寺尽管是建筑环水池对称布局，更接近于“净

土变”的模式，只是在民国时期的照片中并无这一水池的痕迹。宁波保国寺开凿于南宋的“净土池”更接近于水院，池中也没有平台、建筑，在这里应当是名称的借用，而并非反映一种固定的模式。晋祠圣母殿的鱼沼飞梁也有类似的形态，但却无法建立起它与净土信仰之间的联系。

五、结论

中国园林的发展过程从主体上看是一个文人化的过程。作为中国园林最早出现的部分皇家园囿在后期的发展中文人化的倾向则是日趋明显。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强调诗情画意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而在中国园林中对诗情画意的强调，表现为因地制宜，表现在不断的变化，固定的模式在中国园林中始终不能占有主导地位。

水和水庭是中国园林中重要的景观要素，但同样，水和水庭在园林中同样是一个灵活多变的要素，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

净土变是僧人、工匠、供养人对佛教中净土世界的理解，尽管在后来中国的寺庙中有净土池之类的称谓，敦煌壁画中关于“净土”的“净土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建筑、园林的情况，但这种建筑与园林的形态、关系并未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被固定在中国寺庙园林或净土宗寺庙园林中。在中国现存的寺庙园林中也无法看到以净土为名称与敦煌净土变图完全契合的寺庙园林。

- 注 1：《兰亭集序》
- 注 2：《高僧传·慧远》
- 注 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P242
- 注 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P246
- 注 5：《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P179
- 注 6：《长安志》
- 注 7、注 8：《酉阳杂俎·寺塔记》
- 注 9：《冷泉亭记》
- 注 10：《元和郡县图志》
- 注 11：《三辅故事》
- 注 12：《三辅黄图》
- 注 13：《晋书·慕容熙载记》
- 注 14、注 15：《洛阳伽蓝记》

参考书目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中国古典园林史》周维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 《江南园林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三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003